【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两次"国共合作"的特点和关联再探究
——基于当代中国政党第二个集中产生期背景下的分析

李 响[1,3],姚俭建[2],姜天麟[3]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2. 上海社会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3. 农工党中央研究室,北京 100011)

摘 要:国共两次合作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也是对政党制度的重要尝试,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最终建立提供了扎实基础和宝贵经验。两次国共合作的特点各有不同,第一次主要是党内合作、抱团取暖、互相帮助;第二次主要是党外合作、谈判协商、合作与斗争并存。对两次合作的因由、特点、作用进行再探究,以及对在此期间的介于国共两党的中间性党派进行分析,有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新型政党制度创立、坚持和践行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政党;国共合作;中间性党派
中图分类号:K26 **文章编号**:1673-5420(2019)01-0013-13

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决定着这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走向和未来。回首我国近代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无数革命先辈和仁人志士为建立适合国情的政党制度进行了艰辛探索。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入侵,东西方传统文化激烈碰撞,清政府被迫进行君主立宪制的初步尝试,但很快被辛亥革命的大潮所湮没;20世纪初,孙中山在推翻帝制后仿效西方国家建立共和并实行多党制,终被封建势力复辟;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两次"国共合作",由于国民党激化矛盾而破裂,最终证明没有领导核心,合作必

收稿日期:2018-11-20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李 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农工党中央研究室干部,研究方向:政党制度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姚俭建,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民政协理论、社会学、经济哲学、公共政策。
姜天麟,农工党中央研究室原主任,工程师,研究方向:中外政党制度、统战理论。
基金项目:中央社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世界意义"(ZK20170332)

定难以为继;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总结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给中国带来了光明前景。

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轨迹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型政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也正是因为植根于中国大地,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得到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理论的丰厚滋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型政党制度才一步步茁壮成长,展现出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和旺盛的生命力。

从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爆发到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 40 年时间内,出现两个政党集中产生期,第一个是民国初年,第二个则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 24 年间。本文以第二个政党集中产生期为背景,对其间进行的两次“国共合作”进行探究,原因是这个时段产生的中间性党派及两次“国共合作”,是对政党制度的重要探索和尝试,也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最终建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第二个政党集中产生期背景下的中间性党派梳理和基本启示

在第二个政党集中产生期,先后出现了二三十个大小政党和政治派别。因规模与国共两党差距较大,我们统称其为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性党派,中间性党派又可大致分为两类:最终选择了正确道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一类,后也被称为民主党派;最终彻底投靠国民党,沦为附庸的为另一类。我们对其中的一些典型代表进行梳理,观察他们的发展轨迹,可以得出一定的启示。

(一)最终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中间性党派

1. 中华职业教育社。该社由中国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等 48 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于 1917 年 5 月。该社以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责,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改革的先行者。“九一八”事变后,中华职业教育社逐步演变成政治团体,开始积极致力于抗日救亡和民主宪政运动。1941 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 年,又与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共同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

2. 中国致公党。以海外华侨、归侨为主要成分,前身为洪门致公堂。1925 年 10 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堂为党”,正式成立中国致公党。1931 年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反蒋抗日,决定在香港设立致公党总部。抗日战争开始后,致公党号召党员抗日,并发动华侨积极支持祖国抗战。1947 年 5 月,在香港举行第三次

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和告海外侨胞书,提出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3.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0 年 8 月,邓演达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上海创立农工党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1935 年 11 月,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提出在“政治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1]72,最先响应《八一宣言》。抗战期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同盟,成为其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和组织力量。1947 年 2 月,在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上易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1948 年 5 月,响应“五一口号”,参加新政协,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4. 乡村建设派。原为乡村建设协会,由 20 世纪 20 年代末形成的从事乡村运动的地主资产阶级改良派组成,主要分为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村治派”和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教派”。目的是实行乡治,开展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但收效甚微。抗战中期,该派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民盟三党三派中的一派。

5.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该会以上海文化界及其他各界救国会为核心,建立起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抗日救亡组织。1941 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民盟中的左翼。1945 年 10 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1949 年 9 月,参加新政协,年底宣告解散,成员大部分加入民盟或保留盟籍。在其 14 年的发展历史中,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6.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 年 3 月,在重庆特园秘密成立,成为国共以外的各抗日党派的政治联合体,俗称三党三派,即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及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1944 年 9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取消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参加,因此去掉“政团”二字,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在 1946 年政协会议的斗争中,民盟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互相配合,成为我国坚持民主、团结抗战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

(二)彻底投靠国民党,沦为附庸的主要中间性党派

1. 中国青年党。该党信奉国家主义,也被称为国家主义派,因曾创办《醒狮》周刊,又名“醒狮派”。1923 年 12 月 2 日在法国巴黎成立,宣传国家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发起人有曾琦、李璜、李鲁之、李不韪等。“九一八”事变后,该党提出“政党休战”的主张,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组建工作,属民盟中的右翼。抗战胜利后,从中国民主同盟中分化出来,彻底依附国民党政权。

2. 中国国家社会党。该党由一个老牌政客集团沿革而成,与维新派保皇党、进步

党、研究系及基尔特社会主义派、再生社一脉相承。1934 年 4 月,再生社在天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暨国社党成立大会,正式宣告成立。该党从超阶级的国家本位和民族本位出发,标榜国家社会主义,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属民盟中的右翼。1946 年 8 月与在海外同属一个历史系统的民主宪政党合并,改名为中国民主社会党。1946 年 11 月,与青年党一起参加国民党一手操办的“国民大会”,被中国民主同盟开除。

(三)基本启示

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随着基本矛盾的激化和社会阶级力量的分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逐步形成了三种类型的政党,即从 1927 年起快速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始终不渝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与愿望的中间性党派。这三种类型党派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各自的特点和相互关系,是对中国政党制度演变的内在规律的集中展示。当时中国正处在国家不统一、独裁专制横行、国共两党尖锐对立的状态,造成了中间性党派虽然众多,但却不能形成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势力的形势。严酷的斗争现实,迫使中间性党派只能根据各自纲领,在国民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和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之间作抉择。而中间性党派的产生和发展,则对中国政党制度的格局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要过程及相关启示

(一)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原因

1. 中国共产党需要强有力的同盟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其中有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代表的胜利,也有如京汉铁路大罢工遭镇压,即“二七惨案”的失败。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有强有力的同盟者。1922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主张邀请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2]133。同年 7 月,中国共产党二大明确提出“在先进的奋斗进行中间,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3]15。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广泛的联合战线构想,为国共合作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准备。此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分别拜会孙中山,尤其是李大钊多次同孙中山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孙中山曾对李大钊说:“你尽

管一面做共产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国民党)帮助我。”[4]61 此外,共产国际也指示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加强同国民党的合作。

2. 国民党改组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

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启发,经历两次斗争失败的孙中山逐渐认识到要振兴国民党,必须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造,也必须改变依靠一个军阀打另一个军阀的传统做法。他邀请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员在保留共产党员党籍的情况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接受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新当选的 25 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在 17 名中央候补执委中,共产党员有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始。大会宣布党内改组完成,正式进入中国国民党阶段,使之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当时革命政权和革命战争的核心力量,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此,国民党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创办黄埔军校,组建革命军队。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国民政府。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右派的阻挠破坏和共产党的右倾主义是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而这两点也是相伴相生、紧密联系的。

1. 国民党右派的阻挠破坏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让步

国民党虽经改组,但实际分左、中、右三派,并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各持不同态度。其中,右派从国民党一大起就一直反对共产党的加入,他们提出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企图破坏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在反对共产党的问题上更加明目张胆。是年 11 月,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老右派分子,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大肆诬蔑国共合作,破坏革命统一战线,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在统一广东的革命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1926 年 1 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 256 人,共产党员代表占 100 人左右。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身份出席大会,代表军事委员会作了军事报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并在二届一次中央执委会上,当选为 9 名常务委员之一。此次选举的结果对中国共产党非常不利。第一,36 位中央执委中,共产党只占了 9 位,比原计划少一半;在 24 位中央候补执委中,共产党只占 8

位,而一些右派却纷纷当选,造成了中央执委右派势力大、中间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第二,只开除了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两人的党籍,其他人都被从宽处理,有的还当选中央执委。周恩来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是政治上的让步。”[5]119从国民党二大开始,国共合作走上了下坡路。

2. 国民党右派的阻挠破坏及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让步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工农革命运动的逐步扩大,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也加紧开展反革命活动。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1926 年 3 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给予强有力的回应。周恩来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是军事上的让步。”[5]119

3. 国民党右派的阻挠破坏及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让步

1926 年 4 月 2 日,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并在 1926 年 5 月 15 日至 22 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员纷纷辞职,刘伯承辞去中央秘书处书记、谭平山辞去组织部长、毛泽东辞去宣传部长、林伯渠辞去农民部长的职务。蒋介石亲自接任了组织部长并兼任新设的军人部长,他的盟兄张人杰当选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会议还发布了对时局的宣言,决定北伐。周恩来说:“这是第三次大让步,党务上的大让步。”[5]121

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断让步,让国民党右派更加穷凶极恶。1927 年 4 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随后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摧残。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卫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反动口号,与共产党公开决裂。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彻底破裂。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要特点和相关启示

1. 合作形式是党内合作。国民党不赞成党际合作,原因是如果进行党际合作,两党至少要平起平坐,势必要争夺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因而国共两党采取的合作形式是,全体共产党员在保留共产党员政治身份的基础上,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合作中保持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国民党而言,增加了其活力,有助于对党的改造;对共产党人而言,获得了更好的发展平台,在国民党内大量充实革命分子,培养强有力的国民党左派,有助于其未来发展壮大。

2. 合作特点是抱团取暖、互相帮助。从国民党的角度讲,其虽是一个大党,但要取得全国政权,自身的能力还难以达到。在共产党的帮助推动下,旧三民主义转为新三民

主义,成为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并且随着新鲜血液的注入,国民党顺利完成了改造,成为以反帝反封建为纲领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从共产党的角度讲,成立之初不足千人、力量薄弱,又受到北洋军阀的打压,要想打开局面,与国民党合作是一个明智也是必然的选择。国共合作后,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给共产党创造了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并给自己开辟了一条到农民中间去的道路。党员人数迅速增长,从 1925 年 1 月的 994 人发展到 1927 年 4 月的 57 900 人。

3. 中国共产党由此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性。在蒋介石筹划“四一二”政变的过程中,原清末政学会建立的政学系发挥了重要的智囊作用,助其掌握军权并最终夺取国民党最高领导权。而共产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未能将枪杆子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虽有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但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运动”[6]17。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武装。

4. 为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双方合作初期,孙中山十分重视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在国民党中央执委、部分部门和地方组织中均有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其实质是采取一党为核心的合作形式,国共双方既不是执政与参政的关系,也不是执政与在野的关系,而是在一个局部区域联合执政的关系。确保一个核心的合作方式,客观上对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提高战斗力、推动国民革命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和相关启示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契机和基础

1. 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发表营造了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环境,争取了人心。1935 年,日寇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媚日卖国政策。在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号召“全国各党派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7]13。此号召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中间党派的积极响应,比如国民党临时行

动委员会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在当前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严重形势下,“为抗日救国,应急起行动,要本着过去的精神,重振组织,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1]67,继而积极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也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2.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重要契机。1936 年 1 月,毛泽东、朱德等联名签署《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8]13。此举感动了东北军将士,激发了他们抗日反蒋、打回老家去的爱国情绪,为日后“逼蒋抗日”的实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36 年 12 月 12 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迅速确定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被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所采纳。12 月 24 日,蒋介石认可谈判结果,被迫接受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政治犯、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

3. 中国共产党的“五项主张”“四项保证”为国共合作谈判奠定了基础。1937 年 2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主张,并作出四项保证。这既是从民族大局出发为加速实现对日作战作出的适当让步,又坚持了原则,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保持绝对领导权,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显示出极大的诚意,受到全国各党派和各界群众的热烈拥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过程

最初谈判从 1937 年 2 月开始,一直持续到 1937 年 7 月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蒋介石、宋子文等,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举行多次会谈。但由于国民党缺乏诚意,第一轮谈判并未达成实质上的协议。

“七七事变”爆发后,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率全体红军,向蒋介石发电报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9]1937 年 7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庐山举行会谈,并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和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制定宪法和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阐明中国共产党为共赴国难、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宣言》疾呼:“寇深矣! 祸亟矣! 同胞们,起来,一致团结啊! 我们伟大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能屈服的,为推翻日

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10]但蒋介石仍未对抗日下最后决心,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再次被搁置。“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扬言 3 个月内让中国灭亡,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受到威胁,蒋介石最终下定决心,正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 年 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该社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要特点

1. 合作形式是党外合作。表面上看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但实际上双方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在各自政党的领导下,各有地盘、有军队、有政权并存的党外合作,抗日救国成为双方共同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在以团结抗日为同一目标的基础上,各自为政,开创了“一国两制”的先河。

2. 合作组织机构是国民参政会。蒋介石最初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的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建议,但并未实际推进。后因全国人民及各党派和民主人士不断呼吁,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进行部分改革,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民族革命同盟的建议,并设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容纳各党派并允许各党派代表议论国事的机构。该机构虽然只是一个建议性、咨询性的机构,对国民党政府没有约束力,但是给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然而,国民党的转变并不彻底,始终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这也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严重障碍。

3. 合作方式是谈判协商。因没有实质性的组织形式,也没有共同纲领,双方多采用遇事协商, 道义承诺比重颇大的“中国传统形式”合作。国共两党之间几乎所有的重大矛盾和纷争,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不可避免地诉诸谈判并通过谈判来解决。直接谈判增进了两党对彼此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分歧,消解了矛盾,维系了两党长达十年之久的合作。

4. 合作与斗争并存。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 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之外, 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 矛盾与纷争不可避免,斗争的焦点主要有:第一,在国民参政会中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夺。因为国民党对中间性党派并不重视,给共产党提供了与中间性党派合作的契机。在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在国民参政会通过共同提交提案等方式密切合作,并借助聚餐会、座谈会、茶话会、拜访、谈心、祝寿等多种形式,加深对彼此的了解。据《黄炎培日记》记载,从 1938 年 5 月到 1945 年 12 月,各党派负责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各种形式的聚会有 120 次之多。正是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的、公开的舆论阵

地,中国共产党联和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同国民党一党专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各中间党派也正是在此过程中,看到国民党顽固派对民主的摧残、对异己的迫害,同时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和无私。为了抵抗蒋介石的打击,加强同共产党的合作,各中间党派在征得中国共产党的同意后,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形成第三者性质的政治联盟,在支持中国共产党及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国共两党争夺各自势力范围的斗争。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斗争。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国民党的嫉恨,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使国共两党关系几近破裂。毛泽东明确指出:“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1]402 共产党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加之各抗日党派对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一片声讨,国际上的美、英、苏等国也不同意国共分裂,使国民党顽固派一度陷入空前的孤立。

(四)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的成果和启示

1. 推动了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发展为全面抗战。以国民党为主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为主的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相互协同,并在一定意义上相互独立,在人民的广泛参与下,军民一家、同仇敌忾、英勇奋战,取得了近代中国抗击外来入侵者的首次彻底胜利,洗雪了近百年的民族耻辱。历史证明,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仅把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而且为实现国家完全独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和进步,作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

2.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1942 年 1 月,美、英、苏、中领衔签署 26 国《联合国家宣言》;1943 年 10 月,美、苏、英、中国共产党同签署莫斯科会议《关于普遍安全的四国宣言》;1943 年 11 月,中国参加开罗会议,并与美国、英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报》;1945 年,中国同美、英、苏一道发起建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初步确立在国际上“四强地位”。美、英、巴西、比利时、加拿大等国相继发表声明,废除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无论是四强地位的确立,还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从根本上讲,都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军民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

3. 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全面成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坚持“两手对两手”,斗争与合作并存,政治上思想上更加成熟。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深刻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到抗

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成为拥有 120 万军队、领导 1.5 亿人口的国内两大政治力量之一,政治影响力空前提高。

4. 深刻影响了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暂时结束了全国分裂的局面,各派政治力量拥蒋抗日的决心空前一致,国民党政治地位和威信不断提高,组织发展积极推进,党员数量稳步增加;另一方面,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又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限共、独裁等消极倾向明显增长,受到广大民众的质疑和抵触,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下降。同时,第二次国共合作使中间党派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政治舞台,壮大了中间势力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政治的民主和进步[12]。

也有学者提出,第二次国共合作可以类同于两党制。笔者认为,这是有失偏颇的。西方两党制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两个势均力敌的政党通过竞选取得议会多数席位,或赢得总统选举胜利,而轮流执掌政权的一种政党制度。而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双方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民族的独立而采取的合作。在国家政权层面上,合作由国民党来主导,共产党只是参与,目的是协调关系,一致对外。在组织形式上,合作的双方不是对等的,国民党把共产党当作地方武装力量,可以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活动,提一些提案和建议。在制度建设上,国共两党只是“协定”,没有具体的规定,更没有政党间详细的规则、制度来保障。国共两党虽然处于对立状态,但两党间不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而是有各自执政的区域。因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培养出两党制的土壤,没有形成西方两党制的基本要素,与西方的两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更谈不上是两党制的尝试。

四、结论

两次国共合作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第一次国共合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方面,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的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双方抱团发展等一系列成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积累了宝贵经验;另一方面,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大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被血腥屠杀的惨痛教训,提醒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保持军队和政权的独立性。两次国共合作都面对着极其强大的敌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北洋军阀是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又成为依靠单方力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合作规模上讲,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包括一切赞成抗日的阶级和阶层的合作,具有

广泛的民族性,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事关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通过国共两党和各方的共同努力,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促成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全国人民、各党派、各军队、各阶层人士及海外爱国华侨政治势力迅速集结在保家卫国、抗日御侮的旗帜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中间性党派也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最终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贡献了力量。

参考文献:

[1]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研究室. 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道路[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2] 彭明,金德群,编.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二册补编(1919 - 1927)[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 中国档案馆,编. 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C]. 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4] 陈漱渝. 宋庆龄传[M].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

[5] 周恩来文集: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3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9] 红军改编抗日:为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EB/OL]. [2018 - 10 - 25]. 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5/05 - 25/7298886.shtml.

[10]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EB/OL]. [2018 - 10 - 25]. https://wenku.baidu.com/view/9b27310eb8f67c1cfbd6b8b7.html.

[1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2] 潘洵.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贡献及其启示[EB/OL]. [2018 - 10 - 25].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368677.html.

(责任编辑:楼启炜)

Re-explo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levance of the two “Kuomintang-Communist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econd concentration perio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parties

LI Xiang[1,3], YAO Jianjian[2], JIANG Tianlin[3]

(1.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Shangha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Shanghai 200237, China
3. Research Room, Chinese Peasants and Workers Democratic Party, Beijing 100011, China)

Abstrac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s a major event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attempt of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nd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an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final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collaborations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re different. The first is mainly intra-party cooperation, holding together for strength and helping each other; the second is mainly outside-party cooperation, with coexistence of negotiation and consult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asons,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two collaborations, as well as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mediate parties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is period, will be conduciv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persistence and practice of the new party system.

Key words: political parties; Kuomintang-Communist cooperation; intermediate parties